

書名：《中國的“詩史”傳統》

作者：張暉

出版：三聯書店

出版日期：2012年11月

頁數：346頁

“詩史”、“以詩證史”、“詩史互證”，這些大家都耳熟能詳，但要明晰地說出其內涵、歷史發展脈絡，却又相當困難。關於這些術語概念、理論問題，學界雖有廣泛地關注，但却不夠系統深入，張暉先生新近出版的《中國的“詩史”傳統》一書，通過紮實的文獻考辨與理論闡釋，探討了“詩史”內涵的形成及增衍，梳理了“詩史”說的歷史圖景，並對“詩史”傳統與抒情傳統、“以詩證史”與“詩史互證”等加以辨析反思，極具開拓性，推進了這一領域的研究。

一

中國文學批評史的許多概念，一向被認為恍惚難懂，不要說氣韻、滋味、風骨、意境、興象、性靈、格調之類，即便是字義清晰如“詩史”，實際上也是意涵複雜、難以闡釋，因為不同的時代或者相同時代的不同批評語境，“詩史”一詞往往歧義紛出，內涵甚至也大相徑庭。有學者指出“詩史”一詞的內涵，僅在兩宋就有九種之多，加之，此後還有不斷地增衍。因此，厘清“詩史”這一中國文學批評核心概念的內涵與歷史發展，就顯得尤其重要。

鑑於此，張暉先生結合具體的歷史語境，梳理辨析“詩史”一詞在各個時代的不同內涵，進而精細勾勒“詩史”概念的歷史

發展脈絡，闡發其理論意義。首先，作者著力分析孟榮《本事詩》“詩史”概念的意義，指出這一概念甫一誕生，就與《春秋》學說和抒情傳統有密切的關聯。其次，是對“詩史”說建立關鍵時期——兩宋的精細辨析。作者認為“詩史”說的一些主要內涵在北宋都已出現，進入南宋以後，逐漸收窄。有宋一代，“詩史”二字雖然主要指稱杜詩，但也逐漸成熟為文學批評上的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術語。再次，是對“詩史”理論發展的重要階段——明清兩朝的透闢解讀。朱明一朝，“詩史”的概念得到了復古詩論的強烈關注，如楊慎、王世貞、許學夷等都有不少論述，且多有論爭，但其批評理路却又相當一致，即都認同詩歌應該記載時事的“詩史”內涵。不過，這些論爭又涉及到中國詩學的兩個傳統，即抒情傳統與詩史傳統，如楊慎希望詩歌記載時事，不應直陳，而要含蓄蘊藉，追求言外之意；王世貞則以“賦”法為例，強調詩歌原本就有直寫時事的傳統，何必追求言外之意；看似反對“詩史”說的許學夷，實際上也贊同詩歌記載時事，不過，他認為不應失去詩歌的文體特性，成為歷史敘事的附庸。這些觀點引起了明末清初詩論的廣泛回應，如王夫之主張將詩歌與歷史嚴格區分，但却並不反對詩歌中以美刺的方式表達對現實政局的態度；錢謙益、黃宗羲、屈大均則強調“《詩》亡而《春秋》作”，重視詩歌的紀實功能，不過，為規避歷史敘事對詩歌美學特徵的擠壓，也重視詩歌敘事上的“比興”策略。入清以後，“詩史”概念的發展一直受到宋明以來“詩史”理論的影響，如“以詩證史”、吳瞻泰的重視詩法、王懋竑的重視敘事以及陳沆的以“比興”解釋“詩史”的理論等。張暉先生通過細緻的材料梳理與精妙的理論辨析，為我們呈現了“詩史”概念與內涵的歷史發展脈絡。

張暉先生在分析、呈現“詩史”內涵衍變的歷史脈絡時，一直關注著兩個重要的問題。一是反思“詩史”觀念與中國詩歌抒情傳統之間的關係問題。作者指出：詩騷所奠定的抒情傳

統，往往強調個人情感與家國記憶的交融，杜詩無疑繼承、發展并強化了這一傳統，而奠定在杜詩闡釋基礎之上的“詩史”說，在保持詩歌抒情本質的前提下，通過美刺、比興等手段，把原本屬於詩人個人的情感，提升到家國社會的集體情感，充分滿足了詩歌記載政治時事的要求，補充了抒情傳統建構的若干不足。整體而言“詩史”說是《詩》與《春秋》并重，抒情傳統與紀實傳統相輔相成。但也有一些詩人與詩論家偏執於紀實，如以白居易新樂府運動為代表的詩歌忠實記錄外部世界的觀念，在宋代和清初曾得到較為廣泛的關注，詩歌由此成為歷史的史料，而創作詩歌的目的就是為了保存歷史。這種觀念受到蘇轍、何良俊、王懋竑等的批評，他們認為元白的詩歌缺失了詩歌本身的美感。張暉先生指出此種紀實理論與抒情傳統的衝突，直到清代才得以解決，“清代大量的詩歌箋注者利用以詩證史的方法來閱讀詩歌，開始重新重視詩歌的文體特徵，強調詩人通過比興、美刺來委婉地傳達對現實重大事件的看法，從而將強調紀實或模仿的‘詩史’說重新納入抒情傳統之下”。二是把詩歌當做歷史來看的觀念并非天生的、開始就有的，而是經過漫長的發展過程，經過很多理論家的辨析逐漸得來的，而且，這種觀念在整個有關“詩史”的理解中也不是唯一的，而是有多種理論內涵與指向。張暉先生指出：“詩史”一詞在唐代末年產生之後，逐漸演變成一個具有豐富理論內涵的文學概念。在不同的時代，“詩史”說擁有多量不同的內涵。但經過宋明以來不斷地討論，詩歌要在保持詩歌抒情美學特徵的基礎上記載現實，成為“詩史”說的主要內涵。

## 二

《中國的“詩史”傳統》致力於通過討論以詩為史的“詩史”觀念，來反省詩史互證、文史互證的學術方法的來龍去脈及局限

所在。“詩史”說不僅影響到詩歌創作，而且還影響到後世閱讀與研究詩歌的習慣，並與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等觀念結合起來，形成一套“詩史互證”的學術研究方法。這種方法至今依然被廣泛使用。

不可否認，“以詩為史”的閱讀方式與“詩史互證”的研究方法有其重要的理論價值與學術意義，但如將其作為闡釋詩歌的單一維度，則是危險的，也是應該警惕的。在清代“以詩為史”的閱讀風氣與箋注方式盛行之際，紀昀、畢沅等都對此表達了不滿與憂慮。進入現代，也有不少學者開始反省批判這種閱讀方式與研究方法的弊端，如1962年郭紹虞先生在《杜詩鏡銓·前言》中指出：“大抵自詩史之說興，而注杜者遂多附會史事之論。……杜詩反映了當時的現實，以史證詩，當然無可非議，但強加附會，則失之鑿，甚至捏造史實，則更近於妄。”反對最為激烈的當推錢鍾書先生，他的幾部重要著述如《談藝錄》、《宋詩選注》、《管錐編》，均對“詩史”提出了批評，他說：“蓋‘詩史’成見，塞心梗腹，以為詩道之尊，端仗史勢，附和時局，牽合朝政；一切以齊眾殊，謂唱嘆之永言，莫不寓美刺之微詞。遠犬吠聲，短狐射影，此又學士所樂道優為，而亦非慎思明辨者所敢附和也。學者如醉人，不東倒即西欹，或視文章如罪犯直認之招狀，取供定案，或視文章為間諜密遞之暗號，射覆索隱；一以其為實言身事，乃一己之本行集經，一以其為曲傳時事，乃一代之皮裏陽秋。”（《管錐編》第195頁）錢氏極力反對將詩歌當作歷史來閱讀，並認為這種閱讀與研究習慣是“詩史”觀念造成的。張暉先生對此也有敏銳的觀察與省思。

首先，他指出“詩史互證”的研究方法至今依然在實際的閱讀與研究中之有效，且處於強勢，又因其具有跨學科的特徵，而得到文學與歷史兩個專業的同時認可。對此，作者不無憂慮，認為對於“以詩為史”閱讀傳統的追捧，存在很大的盲目性。而實際研究中，更是存有大量的生硬拼湊與牽強附會，或將紀史功

能作為詩歌的主要價值，或捕風捉影式地將詩歌中的比興美刺指向於政治事件。更有甚者，將“詩史”作為一種審美評判的準則，以此衡量詩歌的價值高低，只要詩中出現與時事交涉者，就冠以“詩史”的美譽。作者認為這種閱讀方法的濫用，“非但不能為現有的研究開拓新的思路，反而遮蔽了詩歌闡釋的豐富的可能性”。

其次，張暉先生反思這些問題時，並沒有走向過分批評“以詩為史”閱讀習慣的偏執，而是中肯地告訴大家，“以詩為史”閱讀方式與“詩史互證”研究方法的適用範圍是有限度的，不可隨意運用，應該針對具體對象選擇研究方法。他指出：“歷史上僅有宋末、明末清初兩個時代的詩人被當時或後世較多地尊稱為‘詩史’，這兩個時代都存在史官缺席、史料貧乏的問題，而詩歌因為篇幅短小，詩人可隨時隨地利用詩歌這種形式記載所思所感，所以，詩歌可用來補充歷史敘述的不足。”並以明遺民錢澄之為例加以分析，探討錢澄之如何在“以詩為史”的觀念驅動下從事詩歌創作，如何將此詩歌觀念貫徹到史學著作《所知錄》中，以及詩與史交融又會出現何種情况等。相反，在研究歷史記載十分豐富的時代時，相形而言，片斷的、經驗性的詩歌中的歷史記載就顯得渺小甚至可以忽視，則不必過分倚重“以詩為史”、“詩史互證”的閱讀與研究方法。

再次，張暉先生在反思“以詩為史”的閱讀方式與“詩史互證”的研究方法時，體現了一種融通的態度。他認為“記載歷史，本是詩歌眾多功能中的一項。詩歌當然可以幫助我們進入歷史的閱讀。……‘以詩為史’的閱讀，可以讓詩歌在政治史、文化史、社會史、物質史、情感史、性別史、醫療史等眾多不同的歷史研究中發揮重要的作用”。同時又提示說：“上述的閱讀必須建立在如下的認識之上，即充分明白詩歌是一種特殊的文獻，而非用來簡單證明歷史的文獻材料。閱讀者要充分了解詩歌的體制和美學，掌握語言文字的細微之處，熟悉同一時代詩歌文本

的趨同與差異,才不至於對詩歌的意義產生錯誤的把握,從而導致對某些歷史信息的誤判。最後方可曲徑通幽,由詩歌的微妙門徑進入更為廣闊、真實、豐富的歷史闡釋空間。”

### 三

《中國的“詩史”傳統》的貢獻體現在多個方面,其研究方法與切入視角,對我們也多有啟發。目前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中,術語、概念或範疇的研究比較流行,成果較為豐富,該書可歸入學界常說的概念研究。但需要指出的,該書並沒有作單純的概念分析,在方法上與一般的古代文學批評中的概念研究也多有區別。

首先,張暉先生強調要回到具體的歷史語境中討論問題,而不是用理論邏輯去掩蓋或遮蔽歷史文獻所能傳遞出來的各種信息。因此,作者盡力將每一條材料加以系年,希望通過材料的歷史順序呈現“詩史”概念的起源和發展。在考察“詩史”說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時,作者也有針對性地使用研究方法,在注重細緻考索每條材料所處不同歷史語境和特殊內涵的總體觀照下,因為研究“詩史”說不同的歷史階段,所關注的問題有所不同,因此,也應採取不同的研究方法。兩宋是“詩史”概念的形成時期,關於“詩史”的論述往往比較零散,對此,張暉先生在研究時受到福柯“知識考古學”的影響,注重挖掘和打撈歷史碎片,依據宋代“詩史”說產生時代的先後,將宋代“詩史”說劃分為四個階段加以討論,從而較好地呈現了“詩史”說在兩宋的複雜樣態。

其次,張暉先生在該書中體現了強烈而清晰的問題意識。他對“詩史”的研究不作一般性的敘述,而是盡量圍繞問題展開討論,注重探討歷代各類“詩史”說的內涵和外延,重點考察“詩史”說是通過何種途徑建構并發展起來。另外,“詩史”說所關

聯的抒情傳統與紀實傳統，以及“以詩證史”的閱讀方式、“詩史互證”的研究方法等問題，也是作者所措意反思并解決的。需要指出的是，該書所討論的是中國文學批評研究中的重要論題，歷史跨度長，已有研究成果多，這些無疑都增加了研究與寫作的難度。如果沒有清醒的問題意識，則會掉入資料的泥淖，或糾纏於學術觀點的紛爭之中。譬如，關於“詩史”概念在明代的論爭，學界已有豐富的研究成果，但這些研究的著眼點多在評說孰對孰錯。張暉先生跳出了這種判斷是非的思路，將討論的重點聚焦於弄清明人爭論背後的路線究竟有無分歧，其分歧到底表現在何處等問題上。這樣的思路，同樣顯示了張暉先生強烈的問題意識。

再次，作者對該書的研究框架與章節安排也頗具特色。“詩史”說唐宋以後的每個時段都有頻繁地出現，如純粹按照歷史順序加以梳理敘述，則會出現許多的重複之處。因此，作者特別注重考察每一種“詩史”內涵首次出現時的歷史語境，以及這一內涵的歷史回響。譬如，一種內涵在宋代出現後，清代的理論家雖然仍會時常提及，但卻並沒有任何變化，該書僅會在討論宋代首次出現時順帶提及它在後世的反響，而不會在討論清代“詩史”的時候加以重複處理。另外，作者還在每章的結尾部分，對大量材料所呈現出來的紛雜的意義進行及時地總結，並在全書的結論部分加以宏觀的理論反思與演繹，這樣，使得讀者可以對該書每個章節所要討論的問題與結論，一目了然，不僅如此，還有效地彌補了或避免了大量考釋所帶來的文獻主義的研究傾向。而附錄三種也對正文有重要的補充作用。

總之，張暉先生通過全面、系統地考索“詩史”一詞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情況，理清了“詩史”說的由來、基本內涵，以及其理論上的漏洞與不周延；辨析了“詩史”說所關涉的紀實傳統與抒情傳統，釐清了蘊藏於“詩史互證”方法背後的理論傾向，

呈現了“以詩爲史”傳統的形成軌迹。對學界認識“詩史”說內涵的豐富性、複雜性及歷史進程,反思“以詩爲史”的閱讀方式與“詩史互證”的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與理論意義。

江蘇師範大學教授、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  
文明系訪問學者 沙先一